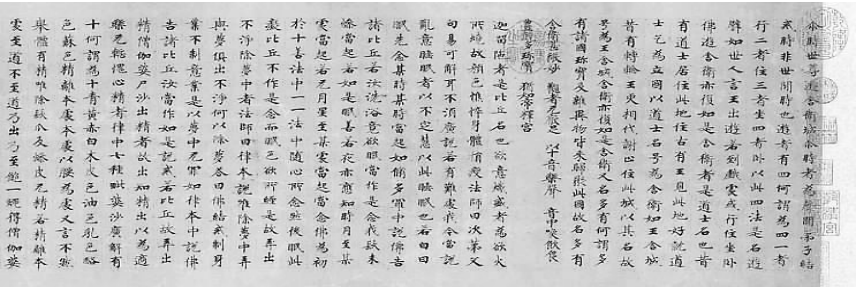


有了印刷术 为何还手抄

“游四方十有八年,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,则留。或手钞,或募人钞之。”这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、学者顾炎武在《抄书自序》中写下的话。意思是自己嗜书如命,云游天下多年,遇允许他看私人藏书者,他就会留住一段时间,或亲自手抄,或雇人手抄。



唐代国诠书《善见律》卷。国诠是初唐经生。此卷为其手抄小乘佛教律部重要经典《善见律》。

引人好奇:此时印刷术已发明千余年,活字印刷也发明了近600年,为何顾炎武还在抄书?

一方面,这是一种学习方法。从少年时代起,顾炎武便每日将所读书抄录下来,以加强记忆。

另一方面,好书难寻,只能手抄。比顾大3岁的著名思想家、学者黄宗羲也抄书,他给自己的藏书楼起名便是“续钞堂”。

目录学家袁同礼先生说:“明人好钞书,颇重手钞本。藏书家均手自缮录,至老不厌。”到了清代,名藏书家吴翔凤因抄书过劳,致一目失明。新技术取代旧技术,高效率战胜低效率,乃自然之理,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,为何直到清末,抄书行仍存?而更先进的活字印刷不仅未能取代雕版印刷,反被边缘化?

事实证明,新技术与进步并非简单的对等关系,随着文化、管理、市场、社会等多方面条件具备,剧变才会发生。只有单独的技术革新,意义有限。

又是一年“世界读书日”,借此契机回望历史,或有助于更立体、更全面地看问题,本文主要依据学者董火民的《中国古代抄书研究》、娄冰的《古代私人抄书变迁考究》写成。

蔡文姬能背400多本书

民间抄书,或始于战国。此前的西周垄断文化,“官守学业,皆出于一”。据东晋王嘉的《拾遗记》:“张仪、苏秦二人同志好学,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(剪发卖掉,赚生活费),或佣力写书(给人抄书)。”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手抄书皆属战国时期,如《楚帛书》、郭店楚简等。

秦统一中国后,发布“挟书律”,禁民间抄书,汉初时“天下唯有易、卜,未有它书”。前191年,汉惠帝废“挟书律”,抄书复兴。东汉名将班超年少时“家贫,常为官府书(给官方抄书)以供养。久劳苦,尝辍业投笔叹曰:‘大丈夫……安能久事笔砚间乎?’”遂投笔从戎。

抄书是当时流行的学习方法。东汉高君孟“颇知律令,常自伏写(抄)书”,掌图书的官员悯其年迈,欲代劳,遭拒绝:“我亲自写,等于读了10遍”。

班超的妹妹班昭著《女诫》,提出:“愿诸女各写一通,庶有补益,裨助汝身。”即习此书,需抄录。

抄书提高记忆力。汉末大学者蔡邕藏书“一万四五千卷”“是第一个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超过万卷的大藏书家”,后散失,曹操问其女蔡文姬,蔡文姬将记下的400多本笔记进献,竟“文无遗误”。

东晋时,葛洪“抄《五经》《史》《汉》、百家之言、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”。梁朝名臣袁峻“自课日五十纸,纸数不登,则不休息”。梁朝文学家王筠(名书法家王僧虔之孙)则“少好抄书,老而弥笃”。

自荀悦的《汉纪》以后,杂抄也被视为创作,郭璞抄各家成《新林》《卜韵》,萧子良“集学士抄《五经》、百家”成《四部要略》,裴子野“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”,信都芳抄古今乐事成《乐书》。

不过,商业化抄书渐成主流,三国时阚泽曾“居贫无资,常为人佣书,以供纸笔”。北魏崔光“昼耕夜诵,佣书以养父母”。南朝诗人王僧孺当官前也以抄书养母,抄完一篇,即能背诵,扬州刺史王遥光举荐他,称“既笔耕为养,亦佣书成学”。北齐时,有人向权贵高澄推销《华林遍略》,高澄斗气,“多集书人,一日一夜写毕”,然后将原书退回,称自己不需要。《华林遍略》多达700卷,能这么快抄完,可见职业书手之多。

随着佛教兴盛,各寺庙雇佣抄经者,称“经生”,书迹即“经生体”,北魏刘芳便“常为诸僧佣写经论,笔迹称善”。

一天抄上万字 只能得温饱

唐宋是中国印刷术的突破期,特别是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(有争议),沈括称:“若止印三二本,未为简易;若印数十百千本,则极为神速。”但据周绍明的《书籍的社会史》:“1177年,宋代的皇家藏书,包括主要藏书机构和皇家档案馆,有59.5%的抄本、32%的稿本,印本仅占8.5%。”

原因可能有三:一是皇家支持抄书。唐朝官方至少组织6次大规模抄书,宋仁宗嘉祐年间,一次组织抄书便达1.6万余卷,刻本仅4700余卷。“官修

书”量小,印不如抄。

二是穷书生多,靠抄书吃饭。据唐末牛希济的《荐士论》,唐贵族之家年雇书手万余人,虞世基、杜荀鹤、孟郊等都当过书手,竞争激烈,令白居易感慨:“以此求口食,一饱欣有余。”据陶宗仪记,宋代有的书吏日抄上万字。卷到如此程度,抄本与刻本的成本已差不多。

三是时风崇抄书。抄书是学校的必修课,敦煌文献中存42个《千字文》写本、31个《开蒙要训》写本。苏轼被贬时,靠手抄《晋书》自娱。司马光68岁时仍抄书,“小楷端重,无一笔不谨”。宋高宗身为皇帝,也“亲洒翰墨,遍写九经……自古帝王所未有也”。

学者张功耀《从活字印刷的历史看中国古代技术的特点》一文指出,古代技术发展有“迟缓性”,即:“最晚在晋代,我国就已经具备了产生活字印刷的技术条件。但是,它并不像瓜熟蒂落那样顺顺当当地来到人间,而是迟缓了700年。”

张功耀认为,古代技术与技术相互封闭,造纸、造墨、金属铸造各自独立发展,互不影响,“很难被合成一种新的技术”。不仅技术有隔阂,文化也有隔阂,能写商业文书的人不会写诗词歌赋,看得懂小说的人看不懂政府公告,社会被分割成一个个单元,抑制了需求。

刻本未能替代抄本,则图书品种、印量不足,藏书只能靠抄。唐代柳仲郢藏书万卷,每天下班即抄书,“不舍昼夜”。宋代藏书家可考者200余人,大多靠手抄。名诗人叶梦得藏书多,一年夏日晒书,20多天才晒完,“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”。诗人尤袤藏书3200多种,子弟、诸女都帮他抄书,他对好友杨万里诉苦“抄书每至脱腕”。

为让自己的作品传下去,白居易自誉《白氏文集》5本,分寄5处。

不只男人当书手,也有女人当书手。唐代吴彩鸾“字画虽小,而宽绰有余,全不类世人笔”,她的先生文萧不善谋生,她一日“能了十数万字”,抄一部《唐韵》可得5000钱。

吴彩鸾式成功带来副作用,精品手抄书价高,明代胡应麟说“刻者十不当钞一”,即抄本比刻本贵十倍,藏书家为保值,更愿支持手抄,投资流向低效率生产,拉低了整体效率。

只好把抄书当做修行

明代活字印刷术普及,但据学者李海平钩沉:“有人用清末版本目录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统计,其著录历代书籍7748种,不同版本20000部,其中活字印本仅220部,仅占1%。解放后出版的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共著录历代善本11000多部,其中活字印本也只有150余部,仍不到1.5%。”

中文字多,汉代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已达10516个(算上重复的字),至《康熙字典》,收字47035个,

所需字模远超拼音文字,限制了其发展。明代活字印刷规模较大的安氏去世后,铜字作为遗产,被6子瓜分,“各残缺不全,成为无用的废物”。

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,活字印刷欠美观,因字模有大有小、笔画粗细不一、墨色有深有浅,令文人难接受,只能用来印家谱(现存清代家谱中,80%用活字印刷,因家族内部使用,不重美观)。

活字的印刷量大,可市场欠成熟,一时消化不了,印出的书长期压库,得不偿失。且每印一版,便迅速拆版,取出活字拼下一版,留给校对的时间短,致“多谬多遗”“布置间讹谬尤易”。且检字工、拼版工必须识字,而传统的雕版师多是文盲。基础教育不普及,制约了活字印刷的发展。

美国学者利文森曾提出“补偿性媒介”理论,他在《数字麦克卢汉——信息化新纪元指南》中称:“每一种媒介都是对前一种媒介的革命,都补救其不足;每一种媒介都有其不足,都要靠新一代和新一种媒介来完善。”补偿路径既可以是技术的,也可以是其他的。走技术路径,投入资金多,以完成研发、市场教育等,还要承担试错成本;走其他路径,相对平稳,但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历代王朝均严控资本,人们更不愿冒险走技术路径。

明明有枪有炮,依然要操练大刀长矛,到晚清时,抄本、刻本仍并行。学者高文涛说:“清代的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。但是在清代,从朝廷官府到普通市民阶层,从官修图书、科举考试到文人鉴藏,到处可见手工抄书的书手群体的身影。”

明清著名藏书家谢肇淛、叶盛、毛晋等一边雇人抄,一边亲自抄,他们自嘲“嗜好之勤,互以钞书为风流罪过”。毛晋最多时雇书手两百人,抄本酷似原刊,被称为“毛抄”。毛晋的女婿高培也是抄书高手,其书法“精好,令人不敢触手”。

乾嘉时,书手赵魏“手抄秘书数千百卷,以之换米,困苦终身”。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给寺院当书手,梦想“何如佣书铁佛寺,写经一卷直一缗”,即写一卷经得一匹绢,显然不可能。即使官方雇佣的书手,日子也不好过,因清廷缮书处有严规:每日每人写一千字,扣除休息等时间,年写三十三万字,有错字即罚随时补改。誉录考绩“按字数多寡工拙酌定等次”,“字画不甚端楷者,记过一次,罚写字一万”。

抄书苦,不抄又不行,清代许多学者不计年月、耽于抄书,手写《九经》《十三经》者比比皆是,顾炎武、王士禛、梁同等甚至将抄书视为修行。他们的坚忍令人敬佩,可值得深思是: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德国的古登堡早400多年,活字印刷助欧洲跨越近代化门槛,在中国却未起到同样作用。

蔡辉 来源:北京晚报

卢作孚的“北碚实验”

1927年春,卢作孚出任嘉陵江峡防团练局局长,立志要将川东小镇北碚建成“现代化的城镇”。

北碚山高林密、交通闭塞、匪患猖獗,是出了名的“川东死角”。卢作孚到任后,采取“化匪为民”“寓兵于工”的举措,不到3个月就稳定了秩序,解决了北碚的治安问题。

有人问卢作孚想把北碚建成什么样,他回答:“皆清洁,皆美丽,皆有秩序,皆可住居,皆可游览。”

为了实现这个愿望,卢作孚先是疏浚嘉陵江航道,修建北川铁路,创办天府煤矿、三峡染织厂等数十家现代化企业,解决了就业问题,让老百姓有饭吃有事做;接着兴建了图书馆、博物馆、银行、医院、公园、民众体育场,并开通了电话、邮政、职业介绍等服务;积极整治市容卫生,拓宽道路,建设街心花园。自此,北碚逐步从落后的山村蜕变为有现代化雏形的美丽小镇。

卢作孚主张“尽力搜求人才”,广泛联络黄炎培、蔡元培、李石曾、翁文灏、秉农三、张伯苓、守尔慈等各界名流,为北碚引入智力与社会资源。大力兴办教育,使读书学习、追求新知识新文化在北碚蔚然成风;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,组建理化、地质、生物和农林4个研究所,重点开展川康地区生物、地质、农林等领域研究。抗战时期,大批文教科研机构西迁至此,北碚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教育科学文化重镇。

1929年,北碚举办了四川最早的运动会“嘉陵江运动会”;1932年,北碚民众剧场第一次放映电影;1933年8月,北碚承办了中国科学社的第十八次年会。

1936年4月,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实验基本结束。北碚模式声名远扬,被访华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为“战时中国最大的科学中心”。王剑